

古典文献学的定义、知识结构与价值体现

刘玉才

一、文献学的内涵与外延

中国古代并无文献学之名,但有文献学之实。西汉刘向、刘歆父子校理群书,广集诸本,施以校讎,编定目类,撰写叙录,开创了独特的学术门类。后人遂以“校讎之学”概括刘氏父子的学术工作,把目录、版本、校勘诸学融为一体。颜之推《颜氏家训·书证》、郑樵《通志·校讎略》、章学诚《校讎通义》均沿用校讎之名。近人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最早提出文献学的概念,“明清之交各大师,大率都重视史学——或广义的史学,即文献学。意指以文献为研究对象的传统学问”。193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郑鹤声、郑鹤春的《中国文献学概要》,这是中文世界第一部以文献学命名的著作。郑氏兄弟在该书例言中说:“结集、翻译、编纂诸端谓之文;审订、讲习、印刻诸端谓之献。叙而述之,故曰文献学。”据其内容,可谓与刘氏父子开创的校讎之学一脉相承。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著名文献学者王欣夫在复旦大学开设文献学课程,讲稿后结集为《文献学讲义》,主张狭义的文献学就是目录、版本、校讎(校勘)三位一体。所谓狭义的文献学,实际就是传统校讎之学的延伸。近现代以来,因文献的内涵不断扩展,已经大大超出了其原本之意,故学界改用古籍、古书、古典文献、历史文献、古文献等名称界定传统文献。在这些名称中,古籍、古书专指严格意义的书籍,具有排他性;历史文献、古文献则过于宽泛,致使各类文献形式混在一起,难分主次;唯有古典文献既保持传统四部文献的主体地位,又不排斥相关文献形式。因此,我们倾向于采用古典文献这一概念名称。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以传统文献学为主要内容的图书纷纷出版,但是题名有文献学、古典文献学、历史文献学、古代文献学、古文献学、古籍学、古籍整理学、校讎学等等,颇不一致。如此名目纷繁,足以说明学界对于文献学内涵与外延界定的模糊,对于文献学概念理解的混乱。在这些著述中,关于文献学的定义大致可以划分为三类,我们姑且称之为传统类定义、综合类定义与现代类定义。

传统类定义,认同传统文献学的研究范围,如《中国大百科全书》认为“传

统意义上的中国文献学实际上是以考证典籍源流为核心内容的中国古典文献学”；赵国璋主编的《文献学辞典》，认为“古典文献学一般指广义的校雠学，即由西汉末年刘向父子所开创，又为历代学者不断发展扩充的，以研究古代典籍的分类、编目、版本、校勘、辨伪、辑佚、注释、编纂、校点、翻译和流通等为主要内容的学科”；曾贻芬、崔文印在《中国历史文献学》中指出，“中国历史文献学，就是研究对我国历史上的各类文献进行注释、著录、校勘、辨伪、辑佚等的一门专科之学”；程千帆、徐有富的《校雠广义》，黄永年的《古文献学四讲》，更是严守传统文献学的界域。

综合类定义，视文献学为服务于文史研究的基础学科，或是贯穿文、史、哲、语言、文字诸学的综合性学科。如张舜徽《中国文献学》主张“继承过去校雠学家们的方法和经验，对那些保存下来了的和已经发现了的图书、资料（包括甲骨、金石、竹简、帛书），进行整理、编纂、注释工作，使杂乱的资料条理化、系统化，古奥的文字通俗化、明朗化；并且进一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条别源流，甄论得失，替研究工作者们提供方便，节省时间，在研究、整理历史文献方面，作出有益的贡献，这是文献学的基本要求和任务”。孙钦善《中国古文献学》认为“古文献学是关于古文献阅读、整理、研究和利用的学问”，“古文献学是个交叉、综合的学科”，“古文献就形式而言，包括语言文字和文本形态，涉及中国古代语言文字学和古籍版本、目录、校勘、辑佚、辨伪、编纂学等。就内容而言，分具体和抽象两个方面，具体方面包括人物、史事、年代、名物、典制、天文、地理、历算、乐律等，……；抽象方面主要指思想内容”，“按学术性质分，古文献学又分考据学和义理学”。可谓包罗万象。熊笃、许廷桂《中国古典文献学》主张文献学“除了文献目录、版本、校勘、注释、辨伪、辑佚等传统内容之外，还应包括文献的载体演变、记录方式、装帧形式；文献积聚、散失、整理、兴衰的历史；文献内容从传统到当代分类的变化；文献编纂体裁的分类；文献的检索方法、保藏方法、流通方式等等”。杜泽逊《文献学概要》等书也有类似的观点。

现代类定义，试图跳出传统文献学的窠臼，探索文献学的理论架构和学术主体性，甚至尝试打通传统文献学与现代文献学的界限，使之融为一体。洪湛侯《中国文献学新编》认为传统意义的文献学偏重于目录、版本、校勘，实际只是传授文献整理的方法，有失全面，而完整意义的文献学应该包括“体”（文献的载体、体裁、体例）、“法”（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编纂）、“史”（文献整理、编纂、注解、刊印、典藏等方面的历史）、“论”（历代文献整理研究理论的归纳总结）等几个部分，并把这些内容融为一体，进行系统研究，逐步建立文献学的完整体系。周彦文《中国文献学》认为“文献不可能在没有任何背景因素下孤立的产生，任何一种文献体裁的发生，都有其学术诱因”，主张文献学的研究范围应该是探究各类文献的产生和演变，以及与学术史之间的相互影响。周氏在《由两岸文献学的现况论文献学的定位问题》一文中，还提出架构文献学的方法论及理论系统的初步构想，企图为文献学定位，将文献学从一个

概念领域转化为一个独立的文献学学科^①。潘树广《文献学纲要》力主古典文献学与现代文献学的交融,倡导所谓“大文献学”的概念。其文献学的含义是以文献和文献工作为对象,研究文献的产生、发展、整理、传播、利用及其一般规律的学科,而文献学的研究内容包括理论研究、应用研究和历史研究三个方面。

文献学定义的纷乱歧出,实际是文献学在目前学科体系中定位不清的直接反映。在官方颁布的学科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GB/T13745-92)里,一级学科“中国语言文学”之下有二级学科“古典文献学”,一级学科“历史学”之下有二级学科“历史文献学”,一级学科“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之下有二级学科“文献学”(为了叙述方便,我们称之为“图书文献学”)。三个分属不同门类的二级学科,冠名均有文献学,且所辖内容特别是三级学科名目,有相当程度的交叉。但是,因为所属门类不同,学术出发点和教学内容方面又有较大差异。因此,在目前官方主导的学科体系之下,文献学势必难以界定普遍认同的内涵与外延。

具体而言,前述传统类定义,实际主要是界定二级学科“古典文献学”,该学科因传承中国经典学问而见重于学界,但也面对拘于工具方法、缺乏理论建构、难以融入现代学术体系的批评。目前,部分高校设有古典文献本科专业,都归属中国语言文学系科之下,而实际现代意义上的中国语言文学学科根本无法统摄古典文献学所涉及的广泛内容、诸多领域以及古籍整理的特殊方法。以最早设立的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为例,1959年在翦伯赞、魏建功、吴晗、金灿然等文史学家的倡议下创建,培养目标是文史兼通的古籍整理专门人才,因为要强调传统文字、音韵、训诂之学的训练,故设在中国语言文学系。

文献学的综合类定义,试图融会古典文献学与历史文献学两个二级学科,但似乎只强调兼容并包,而忽视文献学学术主体性的建立,故学术定位只是服务于文史研究的基础学科。现代类定义方面,洪湛侯、周彦文都视文献学为主体学术,进行了可贵的理论探索。洪说在传统类定义的范畴之内,区分体、法、史、论,建构文献学知识系统,见解独到。但是,植根于古典学术基础的文献学,恐怕很难进行条块切割,如果把目录、版本、校勘之学仅视作工具方法,而把郑樵、章学诚诸人的片段论述看做理论,二者割裂,似乎并不符合文献学的历史实践。周说力图摆脱传统文献学定义的羁绊,把文献学置于文化史、学术史的视野之内,用现代术语组织文献学学术体系。然而脱离中国古典学术背景的理论抽绎,势必造成学术特色的泯灭,貌似可以进行现代学术解构,实际与文献学学术实践并不合辙。潘树广的“大文献学”定义,借鉴现代文献学的理念,试图融合古今文献为一体,实际偏重于图书馆学角度的文献管理利用,而忽视古典文献学的学术史意义。

^①周彦文:《由两岸文献学的现况论文献学的定位问题》,《书目季刊》第38卷第1期。

二、古典文献学的知识结构

既然文献学定义的纷乱有其学术分科的背景,在现行学术体系暂时无法改变的情况下,任何统一文献学的内涵与外延,使之涵盖古典文献学、历史文献学与图书文献学三个二级学科的意图,大概都是徒劳的。因此,我们并不主张纠缠于众说纷纭的笼统定义,而是在不改变现行学科体系的前提下,明确三个学科各自的知识架构,特别是核心知识的组成。具体而言,就是通过知识分层的方式,划分出各自的核心层面、一般层面和专题层面知识,以及背景知识。我们认为,在核心知识层面,三个学科具有显著的差异,而在一般知识、专题知识和背景知识层面,三者则有较多的交叉。

古典文献学源于传统的校讎之学,故其知识结构的核心内容首先是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理念指导下,探讨古典目录、版本、校勘之学的学术内涵;其次是通过剖析古籍形制源起,内容辑佚、辨伪,挖掘古籍文本演变的深层意义;再次是探究古籍诠释衍生、文本分解组合的学术史意义。因此,古典目录、版本、校勘之学,古籍编纂、辨伪、辑佚、诠释研究,均以古典文献为研究对象,而且始终贯穿“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宗旨,无疑是古典文献学术体系的重要支柱。二十世纪迄今,由于简帛文献、敦煌文献、海外佚籍的陆续出土与发现,令古籍编纂、辨伪、辑佚诸学获得大量新资料的支持,而西方阐释学理论的介入,也有望对传统的经典诠释进行深入解构。因此,这些方面的研究正在成为古典文献学新的学术增长点。

中国古代书籍的物质载体、形态规制、刊刻印刷、典藏散佚等方面内容,通常是作为图书文献学的核心组成部分,辟有书籍制度史、印刷史、藏书史等研究专题。但是这些方面内容与古籍版本、编纂研究有不同程度的知识交叉,是古典文献学必须关注的领域,因此我们将其作为一般层面知识纳入古典文献学知识体系,而且侧重进行学术史、文化史视野下的考察。

在传统经典文献之外,简帛文献、敦煌文献、石刻文献、域外汉籍、图像文献、释道藏、地方志与家谱等专题领域研究,自二十世纪初以来都颇有开展,随着新资料的陆续发现和研究的不断深入,逐渐成为专门之学。这些专题文献,虽然许多不以书籍样式呈现,而且主要是作为历史文献学开发史料价值的对象,但是其中包含的古籍形制演变、文本校勘、佚书佚文、编纂体例等方面的资料,对于古典文献学具有重要研究价值,因此我们也将其视作古典文献学知识体系非常有益的完善与补充。

此外,文字、音韵、训诂之类传统小学知识,典章制度、年代避讳之类历史文化知识,都是阅读古籍的基本知识储备,但在学科体系里分属语言学和历史学,故只能作为古典文献学必要的背景知识。

三、古典文献学的价值体现

中国文化作为狭义的观念形态,显然无法单独存在,而是需要借助实物制作、规章制度、风俗习惯、语言文字诸类文化载体,方能成为看得见、听得到、摸得着的广义文化现实。其间以语言文字作为表现符号的文献堪称是中国文化的主要载体,而主要以书籍形式表现的古典文献更是凝聚中华民族智慧与经验的结晶。根据相对保守的统计,现存中文典籍总数约有十万种,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语言的文献可与之相提并论。如此浩如烟海的典籍,既是承载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宝贵遗产,又是维持中国文化绵延数千载而未曾中断的纽带。直至现代社会,虽然饱经外来文化的冲击,但传统经典仍是中国人汲取人生智慧、安顿浮躁心灵的文化根底所在。“睹乔木而思故家,考文献而爱旧邦”(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征启》),古典文献积聚有中国文化的认同基础,因此进行学术层面的整理研究与管理利用,无疑应是国家学术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古典文献研究是中国古典学术的核心内容。如果认真审视古代学术史,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思想观点的发挥、学术流派的形成,还是学术成果的表现方式,几乎都是围绕着重要经典而展开。从两汉经学到魏晋玄学、宋明理学、清代考据学,无不以经典文献作为依傍,或进行章句训释,或进行义理发挥,或进行史实考据,先秦经典文本与后代阐释作品共同构成学术文献的主体。历代学士文人,无论读书治学,还是科举考试,都以钻研经典文献为必由之路。近年学界用力颇多的经学史研究,主要是对儒家经典的文本与阐释进行学术史研究,实际完全可以视作古典文献学的组成部分。因此,如果就学术的旨趣而论,古典文献学与国学的内涵最为切近,而时下颇为泛滥的国学概念,几乎成为传统文化的代名词,则偏离了其原本之意。

中国古典学术没有严格的分科观念,故常以文史之学笼而统之,而且文史不分家。现代学术体系建立之后,文、史、哲、考古分属不同的学科,而前苏联细化专业学术模式在中国的推行,更导致各学科均自成一体,壁垒森严。在这一学术体系中,古典文献学面临无法归类的尴尬处境,逐渐淡出学术中心,趋向边缘化,因此导致我们前文述及的对其内涵与外延理解的混乱。我们认为,西方引进的现代学术体系,特别是前苏联的专业分工模式,无法完全概括中国古典学术,强制性的分门设科,实际是在以今律古,戕害古典学术。现代以降,古典学术研究的滑坡,学问大家的罕见,固然有社会政治层面的原因,但学术分科过细的消极影响,亦难辞其咎。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重建古典文献学在传统人文学术研究领域的主体地位,使其成为延续传统学脉、承继古人治学经验的基础之学,维持古典学术于不坠。

古典文献学具有悠久的学术传统,自孔子、刘向父子到朱熹、郑樵、章学诚以及乾嘉诸儒,在从事文献整理研究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理论与方法。其

中尤为重要的就是建立起实事求是的学术态度,倡导无徵不信、多闻阙疑、择善而从等学术理念。古典文献学推崇文本实证研究,形成无证不立、孤证不为定说、不隐匿反证等一系列学术规范。清代是古典文献学研究的巅峰时期,清儒基于文献实证的考据研究方法已经臻于现代科学的境界,许多成果都为考古发掘和出土文献所证明,他们整理的经典文献至今仍是学界依赖的权威版本。古典文献学的学术态度与治学方法,对于传统人文学术领域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由于受学风浮躁的环境影响,时下该领域许多研究课题,热衷理论的归纳推演,忽视文献基础,随便使用二手文献,或者借助电子检索的便利手段堆砌资料,其成果往往无法经受文献实证的检验。因此,注重文献研究不单是作为治学态度,而且应当融入传统人文学术各科研究的学术理念之中。

古典文献学研究还具有现实文化意义。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在中央政府的倡导之下,古籍整理事业颇有开展,大型古籍整理出版项目陆续上马,呈现繁荣之势。古籍整理出版在拟订选题、确定版本、文本校勘、辑佚汇编等方面,都需要借助古典文献学的研究支持,否则很难成为高质量的古籍整理作品。近年出版的古籍整理作品中,有因缺乏目录学知识而把普通古籍当做珍善本者,有因选用底本不当而造成缺卷者,有汇编总集全集而漏辑重要文献者,有辑佚缺乏辨伪造成张冠李戴者,严重影响了作品质量。因此,从事古籍整理决不可率尔操觚,而应先具备古典文献学的训练,熟悉相关文献,且采取审慎认真的态度,方可进行。一部高质量的古籍整理作品,其价值丝毫不亚于一部原创性学术著作。

作者工作单位: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